

杨卫东 著

信仰的构建与解读 ——宗教与美国外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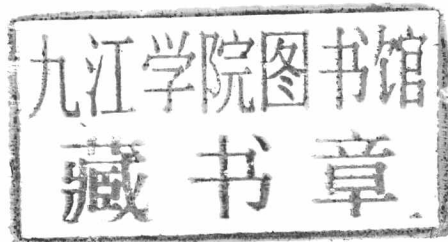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杨卫东 著

信仰的构建与解读

——宗教与美国外交

B928.712/10486



不外借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信仰的构建与解读：宗教与美国外交/杨卫东著.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1. 7
ISBN 978-7-5004-9832-2

I. ①信… II. ①杨… III. ①信仰—研究—美国 IV. ①B9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1) 第 088532 号

责任编辑 储诚喜
责任校对 石春梅
封面设计 格子工作室
技术编辑 王炳图

出版发行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 邮 编 100720
电 话 010—84029450 (邮购)
网 址 <http://www.csspw.cn>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君升印刷有限公司 装 订 广增装订厂
版 次 2011 年 7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1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10×1000 1/16
印 张 20.75 插 页 2
字 数 339 千字
定 价 45.00 元

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发行部联系调换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目 录

导言	(1)
一 宗教与美国外交研究综述	(1)
二 本书研究意义及内容简介	(14)
三 宗教及其社会功能	(19)
四 宗教与政治的内在逻辑	(27)
五 宗教与后冷战时期的国际政治	(28)
 第一章 宗教与美国政治	(35)
一 笃信宗教的西方发达国家	(35)
二 公民宗教——美国的“国家级宗教”	(40)
三 美国宗教与政治的分而不离	(43)
四 宗教与美国选举政治	(48)
五 宗教与美国宪政民主	(52)
 第二章 宗教伦理道德与美国外交	(56)
一 西方视野中的宗教与文化	(56)
二 美国国家特性中的宗教层面	(61)
三 宗教与美国外交理念	(65)
四 伦理道德与美国外交理念	(70)
五 现实主义与自由主义的伦理道德观	(76)
 第三章 宗教使命感与美国外交	(85)
一 使命感的宗教根基	(85)
二 宗教使命感的世俗化	(95)

三	“山巅之城”与美国外交中的孤立主义	(99)
四	输出“美国信条”与美国外交中的干涉主义	(102)
五	使命感对美国外交理念与实践的影响	(110)
第四章	宗教信仰自由与美国人权外交	(123)
一	美国宗教信仰自由理念的确立	(123)
二	宗教信仰自由与美国的人权理念	(136)
三	美国《1998 年国际宗教自由法》	(146)
四	宗教信仰自由与美国的人权外交	(159)
五	宗教信仰自由与中美人权冲突	(173)
第五章	宗教保守主义与美国外交	(184)
一	欧洲政治思潮中的保守主义	(184)
二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的新保守主义	(189)
三	宗教保守主义在美国政坛的崛起	(197)
四	宗教保守主义与共和党的政治联盟	(206)
五	宗教保守主义对美国外交的影响	(212)
第六章	美国犹太教与美以特殊关系	(220)
一	犹太人在美国政治生活中的定位	(220)
二	美国犹太人对以色列的认同问题	(232)
三	基督——犹太联盟与美以关系	(239)
四	美国——以色列关系中的犹太人因素	(247)
五	犹太教利益集团与美国——以色列关系	(253)
第七章	美国与伊斯兰世界冲突中的宗教文化因素	(270)
一	基督教世界与伊斯兰世界冲突的历史回顾	(270)
二	20 世纪 70 年代以来伊斯兰反美势力的兴起	(275)
三	反恐战争与文明冲突的加剧	(282)
四	美国穆斯林与美国的中东政策	(289)
五	美国与伊斯兰世界冲突中的宗教文化因素	(294)

结语.....	(303)
参考文献.....	(310)
后记.....	(325)

导 言

一 宗教与美国外交研究综述

1. 国外研究现状

就“宗教与美国外交”这一主题而言，首先应该明确一个前提，即宗教对美国对外政策究竟有没有影响。在国际关系理论界，尽管自由主义学派对这一问题给予了肯定的回答，但现实主义学派基于传统的马基雅维利式国际政治逻辑，总是习惯于从权力政治角度思考这一问题。所以，一些现实主义学派的学者否定宗教对美国对外政策的影响。但是，绝大多数学者，也包括部分现实主义学派的学者都承认宗教对美国对外政策的影响。

在美国，虽然绝大多数学者乃至政治家认识到宗教与国家对外政策之间有一定的关系，但这种关系如何界定，却又很难把握。美国学者里克·赫里克（Rick Herrick）就认为，宗教与国家对外政策之间的关系，就像人们之间的关系一样，是复杂的，并被含糊不清地掩盖着。^① 另外也有学者承认，宗教群体对外交与防御政策的态度被证明是复杂而较难总结的。^② 由于宗教本身的特殊性，这就造成有关宗教与美国外交之间关系的研究具有很大的不确定性，并难以把握。尽管如此，自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国际学术界（主要是美国学术界）还是在这方面进行了一些有益

① Rick Herrick, "Swords into Plowshares: Some Thoughts as to what went wrong," in Jongsuk Chay, ed., *Culture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New York: Praeger Publishers, 1990.

② Andrew Kohut, John C. Green, Scott Keeter, and Robert C. Toth, *The Diminishing Divide—Religion's Changing Role in American Politics*, Washington, D. C.: Brookings Institution Press, 2000, p. 49.

的探索——虽然这种研究尚处于“幼年阶段”，^① 还没有一部完整的专著面世。纵观国际学术界在这方面多年的点滴积累，已经有一大批研究成果涉及这一主题，主要体现在以下几方面：

其一，一些学者主要从宏观的、与宗教相关的哲学、伦理、道德等相对抽象的价值观层面分析了宗教与美国外交之间的关系。例如，美国学者戴维·拉森（David Larson）于1966年出版的《美国对外政策中的清教伦理》^②，这是笔者所能见到的从清教伦理角度论述美国对外政策的最早论著。拉森认为，清教伦理对美国对外政策具有一定的影响。在拉森看来，清教伦理最显著的一个特点是不相信强权。美国人从传统上就对个人、国家或国际社会的权力持怀疑态度。正因为美国人不相信权力，所以，他们在国内质疑权力，在政治体制构架中对权力进行制衡。正因为美国人不相信权力，所以，他们在国际社会中也就不喜欢权力，不理解权力。清教伦理与美国国家的特点决定了美国人认为国家为权力、声望、财富而奋斗是一种不正常的事情，认为这样的战争是不道德、非正义且非法的。所以，美国立国之后，在国际社会倡导用普遍的国际法作为解决国际冲突的手段。1977年，美国学者约翰·C. 贝内特（John C. Bennett）和哈维·塞弗特（Harvey Seifert）合作出版了专著《美国对外政策与基督教伦理》。作者在前言中坦言基督教伦理并非影响美国对外政策的决定性因素，但作者同时也承认，所有基督教徒在其生活中所做的，应该基于基督的判断。由于其基督教信仰所引发的道德承诺和敏感性应该是他们选择其国家目标和他们作为公民选择其动机的决定性因素。作者还认为，一般而言，国家用普遍的正义或神的意志来表明其利益。这样，国家间的冲突实际上就抽象为正义与邪恶、上帝与恶魔之间的冲突。^③ 1985年，美国学者麦考密克（McCormick）出版专著《美国对外政策与美国价值》，麦考密克在书中阐述了道德外交在美国对外

① John C. Green, James L. Guth, Corwin E. Smidt and Lyman A. Kellstedt, *Religion and the Culture Wars: Dispatches from the Front*, Lanham, Maryland: Rowman & Littlefield Publishers, Inc., 1996, p. 331.

② David Larson, *The Puritan Ethic in U. S. Foreign Policy*, New Jersey: D. Van Nostrand Company, Inc., 1966.

③ John C. Bennett and Harvey Seifert, *U. S. Foreign Policy and Christian Ethics*, Philadelphia, Pennsylvania: The Westminster Press, 1977, pp. 13—18.

政策中的重要性,在他看来,道德主义与孤立主义并列为美国外交传统中的两大本质。^① 1992年,美国学者麦克尔罗伊(McElroy)出版《道德与美国对外政策:伦理在国际事务中的作用》一书,作者也就伦理在美国对外政策中的作用提出了一些自己的看法。^② 另外,1986年出版的《美国人的特点与对外政策》^③、1990年出版的《美国对外政策的哲学》^④以及1998年出版的《美德的讽刺:伦理与美国权力》^⑤都在相关章节论述了宗教伦理道德与美国对外政策之间的关系。除了这些专著性的论述之外,还有一些学者在其专著中在不同程度上提到宗教伦理道德与美国对外政策之间的关系。例如,美国学者小艾尔弗雷德·海罗(Alfred O. Hero, Jr.)认为,自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许多神学家、伦理学家和其他一些思想家,以及与主流新教有关的领导人,大家都在研究、讨论、撰写有关宗教信仰、伦理与国际关系的问题或文章。他认为,宗教机构对美国人关涉世界事务的思想与实践的潜在性影响,并最终对美国对外政策的影响是巨大的。^⑥ 美国学者布鲁斯·尼科尔斯(J. Bruce Nichols)也认为,自立国之初,美国对外政策就糅合有道德与政治方面的考虑。无论那种道德的内容用什么来表述,政治领导人总是需要用宗教的价值观与语言来赢得公众对美国国家政策的支持。^⑦ 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的访问学者、《新共和》(*New Republic*)杂志的资深编辑约翰·B. 朱迪斯(John B. Judis)在其专著《帝国的愚蠢:乔治·W. 布什能从西奥多·罗斯福和伍德罗·威尔逊学到什么》中指出,美国对外政策,源于一种准

① James M. McCormick, *American Foreign Policy and American Values*, Itasca, Illinois: F. E. Peacock Publishers, Inc., 1985.

② Robert W. McElroy, *Morality and American Foreign Policy: The Role of Ethics in International Affairs*, Princeton, New Jersey: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2.

③ Michael P. Hamilton, ed., *American Character and Foreign Policy*, Grand Rapids, Michigan: Eerdmans Publishing Co., 1986.

④ Kurt Glaser, *A Philosophy of American Foreign Policy*, Taipei, Taiwan: Graduate Institute of American Studies, Tamkang University, 1990.

⑤ Ernest W. Lefever, *The Irony of Virtue: Ethics and American Power*, Boulder, CO: Westview Press, 1998.

⑥ Alfred O. Hero, Jr., *American Religious Groups View Foreign Policy: Trends in Rank-and-File Opinion, 1937-1969*, Durham, North Carolina: Duke University Press, 1973, p. v.

⑦ J. Bruce Nichols, *The Uneasy Alliance: Religion, Refugee Work, and U. S. Foreign Policy*,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Inc., 1988, p. 9.

宗教或道德的国家使命或目的。^①

值得一提的是,2003年,美国权威期刊《外交》刊登文章《对外政策领域伦理的提升》,作者分别为美国对外关系委员会主席盖尔布(Gelb)与对外关系委员会执行主任罗森塔尔(Rosenthal)。盖尔布与罗森塔尔重点就冷战后美国参与国际事务中伦理因素的作用进行了一番分析。^②

从上述这些分析可以看出,在美国,有相当一批学者承认宗教伦理道德对美国对外政策的影响,并围绕这一主题进行了有益的探索。

其二,许多学者就宗教信仰因素对美国对外政策的影响进行了重点剖析,这些学者主要从宗教作为一种信仰体系这一角度分析宗教信仰对美国外交的影响。宗教是一种价值判断,从总体上讲,属于意识形态范畴,是西方人所认同的文化的核心。作为一种信仰力量,它会潜移默化地影响到国民、政治家的言行与价值判断。就美国宗教这一庞杂的信仰体系而言,新教信仰中的使命说、福音派宗教保守主义的世界观、源于宗教信仰的宗教自由观,这些都从不同角度影响到美国的对外政策。在这方面,许多学者或政治家就美国国家特性的宗教层面进行了深入的论述。这里,最具代表性的当属康拉德·彻里(Conrad Cherry)于1971年首次出版的《上帝的新以色列:美国天命的宗教解释》^③一书。2001年,美国学者詹姆斯·库尔思(James Kurth)在“费城协会”举办的一次学术会议中提交论文《新教变形与美国对外政策》。库尔思认为,在分析影响美国对外政策的诸多因素时,新教因素往往被忽视了。事实上,在美国历史上,美墨战争、美西战争以及20世纪一十到二十年代美国对中美洲的干涉,都可以看到新教美国假借新教之名,反击天主教世界的现象。所以,作者认为,没有人在撰写19—20世纪的美国外交史时会回避新教的影响。^④此外,有代表性的研究成果还有约翰·盖尔藤(Johan Galtung)的论文《作为天定

① John B. Judis, *The Folly of Empire: What George W. Bush Could Learn from Theodore Roosevelt and Woodrow Wilson*, New York: Scribner, 2004, p. 13.

② Leslie H. Gelb and Justine A. Rosenthal, "The Rise of Ethics in Foreign Policy," *Foreign Affairs*, Vol. 82, Issue 3, May/June 2003.

③ Conrad Cherry, ed., *God's New Israel: Religious Interpretations of American Destiny*, Chapel Hill and London: The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 1998.

④ James Kurth, "The Protestant Deformation and American Foreign Policy," Paper Presented to The Philadelphia Society, 37th National Meeting, April 22, 2001 <http://zeus.townhall.com/phillysoc/Kurth%20Speech.html>.

命运神学的美国对外政策》^①，伯恩斯（Burns）的名著《美国使命观：国家目的与命运的概念》^②以及美国《新共和》杂志资深编辑约翰·朱迪斯于2005年在《政策简报》上发表的文章《被选择的国度：宗教对美国对外政策的影响》等。^③

其三，一些学者就宗教与美国外交之间的关系问题进行了一些局部性、专题性的个案研究。例如，1973年出版的《美国宗教团体的对外政策观：普通人的倾向与观点，1937—1969》^④一书，作者从美国各宗教派别、团体的角度分析了新教各派别、天主教、犹太教对美国介入二战、加入联合国、对抗苏联等国际问题的态度。为了取得一手的证据，作者采取了大量问卷调查的研究方式。2000年出版的《基督教伦理与美国对外政策：赫尔辛基协定与人权》一书，作者以1973—1975年在芬兰首都赫尔辛基召开的欧洲安全与合作会议为个案，深入探讨了基督教伦理与美国对外政策之间的关系。该书的主要专题涉及：道德与美国对外政策、新教教会与人权、教会对美国多元文化的影响等方面。作者分析了宗教、道德、人权与美国对外政策之间的关系。^⑤2000年，来自世界各地的学者汇集伦敦，就“宗教与冷战”这一主题展开深入探讨，会后出版了论文集《宗教与冷战》。该论文集主编、北爱尔兰阿尔斯特大学（University of Ulster）历史与国际事务学院讲师黛安娜·柯比（Dianne Kirby）在序言中指出，宗教在冷战编年史中的位置被系统化地忽视了。然而，对于许多政治评论家与经历过冷战的人来说，冷战是最伟大的宗教战争之一，是有神论与无神论之间全球性的冲突。冷战政治不应该仅仅按照现实主义、权力政治与地缘政治去理解，基于宗教信仰与价值观的意识形态对西方世界形成对苏联的认识与反应方面也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对美国而言，冷战的宗教尺

① Johan Galtung, "U. S. Foreign Policy as Manifest Theology," in Chay, ed. *Culture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② Edward McNall Burns, *The American Idea of Mission: Concepts of National Purpose and Destiny*, Rutgers New Brunswick, New Jersey: University Press, 1957.

③ John B. Judis, "The Chosen Nation: The Influence of Religion on U. S. Foreign Policy," *Policy Brief*, No. 37, March 2005.

④ Alfred O. Hero, Jr., *American Religious Groups View Foreign Policy: Trends in Rank-and-File Opinion, 1937—1969*, Durham, North Carolina: Duke University Press, 1973.

⑤ L. Larry Pullen, *Christian Ethics and U. S. Foreign Policy—The Helsinki Accords and Human Rights*, Lanham, Maryland: Lexington Books, 2000.

度具有特殊的意义。尽管宪法中体现出政教分离的原则,它的人民与领袖仍然强调其宗教的虔诚性,它们的国家在这个世界上具有特殊的道德力量。^①另外,2000年,美国《外交史》上发表《基督徒、穆斯林与印度教徒:宗教与美国—南亚关系,1947—1954》一文^②,作者就特定年代美国与南亚次大陆国家的关系从宗教的角度进行了一番有益的分析。自20世纪70年代以后,基督教福音派在美国政治舞台中的影响力逐渐上升,尤其是布什政府上台之后,基督教福音派与美国内政、外交之间的互动成为一个热门话题。在这方面,英国华威大学(University of Warwick)政治与国际关系研究系教授、2009—2011年度英国国际关系研究协会主席斯图尔特·克罗夫特(Stuart Croft)的研究成果值得一提。2007年11月,克罗夫特在英国学术期刊《国际政治》(后收录于论文集《美国对外政策的新方向》一书)上发表《基督教福音派与美国对外政策》一文。在这篇文章中,克罗夫特分析了基督教福音派自冷战结束以来,在当代美国社会,特别是布什政府时期不断上升的政治现象。鉴于基督教福音派对美国政治的强大影响力,作者借用他人的观点指出,布什政府甚至创建了一个宗教性的美国政党。该文章的主体部分,克罗夫特重点从基督教福音派对社会正义等问题的态度视角分析了基督教福音派对布什政府对外政策的影响。为此,作者选取了以“家庭研究会”(Family Research Council)为个案的美国宗教组织具体分析了这些宗教组织对美国对外政策的影响。在作者看来,基督教福音派更多的是作为布什政府对外政策的支持者而非形成者。^③

进入新世纪,宗教与美国对外政策之间的关系逐渐成为一个热门的学术议题,在这方面,西方学术界不断有新的研究成果问世。2004年,波士顿大学国际关系学教授安德鲁·J.巴切维奇(Andrew J. Bacevich)与助理教授伊丽莎白·H.普罗德穆(Elizabeth H. Prodromou)联合撰文

① Dianne Kirby, "Religion and the Cold War: An Introduction," in Dianne Kirby, ed., *Religion and the Cold War*,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Ltd., 2003, p. 1.

② Andrew J. Rotter, "Christians, Muslims, and Hindus: Religion and US-South Asian Relations, 1947—1954," *Diplomatic History*, Vol. 24, No. 4, Fall 2000.

③ Stuart Croft, "Christian Evangelicals and US Foreign Policy," in Inderjeet Parmar, Linda B. Miller and Mark Ledwidge, eds., *New Directions in US Foreign Policy*, Abingdon, Oxon, UK: Routledge, 2009, pp. 120—135.

《上帝并不中立：9·11之后宗教与美国对外政策》，作者在文章开篇指出，冷战结束以来，回归宗教已经成为美国治国方略中不言自明的潜台词。在美国对外政策中，信守“事件权力”（the power of events）已经使宗教成为一种工具，并利用宗教这种工具服务于美国对外政策的目标。作者特别强调，学者与政策制定者在关注宗教对美国对外政策的影响时要注意两个问题：其一，在分析宗教对美国对外政策的影响时，有可能出现对美国对外政策的分析复杂化或简单化的倾向；其二，如何促使美国国家安全战略目标与世界各种宗教相互协调，不致产生冲突。而自冷战结束以来，尤其是“9·11事件”以来，围绕着这两个问题的讨论不断增多，并使得它们之间的分歧越来越模糊。在作出上述评论之后，作者重点以“9·11事件”为例，探讨了该事件对以小布什为代表的新保守主义的宗教观的冲击。^① 2008年，美国出版界推出了一本新书《信仰与自由的世界》，该书重点就美国《1998年国际宗教自由法》出台的背景及其实施多年以来所存在的问题阐述了作者独到的见解。^② 作者托马斯·F. 法尔（Thomas F. Farr）在美国国务院工作多年，早期主要负责核不扩散方面的问题。1998年，法尔作为主管国际宗教自由首任巡回大使（Ambassador at Large）罗伯特·塞普勒（Robert A. Seiple）的助理，故此，他参与草拟了美国政府涉及国际宗教自由方面的许多文件，并负责处理美国政府与其他国家就宗教自由问题产生纠纷的具体事务。基于这样一种工作经历，法尔对美国《1998年国际宗教自由法》的研究具有一定的深度。

从美国外交史角度上讲，宗教对美国对外政策的影响应该是一个永恒主题，任何学者都不可能穷尽这一主题。在这方面，美国学者威廉·英博登（William Inboden）博士在其新著《宗教与美国对外政策，1945—1960，遏制的灵魂》中选取冷战史的一部分作为研究对象，重点研究了冷战前期宗教与美国对外政策之间的关系。该书分为两大部分：第一部分从宏观上分析了基督新教与冷战的关系，第二部分选取了1945—1960年期间以杜鲁门、艾森豪威尔、杜勒斯等人为代表的一些主要政治家的言行，

① Andrew J. Bacevich and Elizabeth H. Prodromou, "God Is Not Neutral: Religion and U. S. Foreign Policy after 9/11," *Orbis*, Winter 2004.

② Thomas Franklin Farr, *World of Faith and Freedom: Why International Religious Liberty is Vital to American National Security*,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8.

以试图说明这些政治家在冷战期间拟定的美国对外政策受到其宗教思想的影响。英博登博士在解释冷战是一场宗教战争这一主题时指出,冷战史专家大多忽视了宗教在其中扮演的重要角色,他们大多忽视了美国与苏联集团在精神层面的冲突。而事实上,宗教从原因(Cause)与手段(Instrument)两个方面在这场剧烈的冲突中起着重要的作用。从原因角度上讲,宗教回答了美国为什么要反对苏联集团。因为从宗教层面上讲,美国人认为苏联是一个受无神论支配的国家,苏联共产主义是一种教条的无神论主义,苏联共产主义要将其无神论观推广到整个世界。所以,美国人,尤其是一些美国政治家认为,抵制苏联是受到上帝的召唤,重塑整个世界是上帝的意志,美国负有将苏联这个“邪恶帝国”推翻的神圣使命。从手段角度上讲,美国政府借助国民虔诚的宗教信仰,将宗教作为一种潜在的工具,利用公民宗教这杆大旗,号召国民发起进攻苏联的“宗教十字军”,从而强化了美国国内乃至国外反对苏联共产主义的信念。所以,在英博登博士看来,美国政府将宗教作为一种反对“苏联帝国”必不可少的精神武器。^①应该说,就已有的研究成果而言,英博登博士的这本书具有一定的深度。

冷战结束之后,伴随着全球性的宗教复兴与局部地区的宗教歧视与压迫,宗教冲突问题成为国际热点之一。2000年,由美国公众宗教生活研究中心出版的一本研讨会论文集《宗教迫害作为美国政策的一个问题》^②,针对全球性的宗教冲突与迫害问题进行了一番讨论。2001年,由美国前国际宗教自由委员会主席埃利奥特·艾布拉姆斯(Elliott Abrams)主编的《信仰的影响:宗教团体与美国对外政策》一书,汇集了美国学者关于这个问题的9篇论文。该论文集涉及了宗教与美国外交的诸多方面,文章作者从历史、现实两个角度分析了美国政府对世界各地宗教迫害的关注,阐述了美国人对信仰自由的理解,以及宗教团体等非政府组织与政府的关系。该书主编艾布拉姆斯在谈到宗教与美国内政、外交关系时提出四点体会:第一,源于新教遗产的使命感意识对美国对外政策的影响;第二,宗

^① William Inboden, *Religion and American Foreign Policy, 1945—1960, The Soul of Containment*,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8, pp. 2—5.

^② Rosalind I. J. Hackett, Mark Silk and Dennis Hoover, eds., *Religious Persecution as a U. S. Policy Issue*, Hartford, Connecticut: Center for the Study of Religion in Public Life, 2000.

教利益群体对内政与外交的影响；第三，严肃的宗教观念对对外政策制定者的间接影响；第四，一些主要的对外政策对国内宗教舞台具有的影响。^① 2003年，由皮尤宗教与公众生活论坛（the Pew Forum on Religion and Public Life）与布鲁金斯学会联合发起组织了一个小型讨论会，邀请了美国国内6位学者就“宗教与美国外交”这一议题展开讨论。会后，该机构出版了一个专题论文集《自由与权力：在一个不公平的世界中宗教与美国外交的一次对话》^②，该论文集就宗教与美国外交之间关系进行了一些有益的探索。

在美国学术界，学者们把主要精力投入到研究主流宗教—新教对美国对外政策的影响，但仍然有少数学者认识到天主教徒与犹太教徒对美国外交的影响力。鉴于犹太裔美国人对美国政治生活的特殊影响力，美国学者对犹太教徒对美国外交影响方面的研究有一定的进展。例如，美国学者戴维·霍华德·戈德堡（David Howard Goldberg）的专著《对外政策与种族利益集团：犹太裔美国人与加拿大人为以色列而游说》，该书作者分析了美国以色列公共事务委员会（The American Israel Public Affairs Committee, 简称 AIPAC）的发展史、结构特点及其在1973—1988年期间对美国中东政策的影响。^③ 1987年，爱德华·蒂维纳（Edward Tivnan）出版专著《游说：犹太政治势力与美国对外政策》，该书对美国犹太人对美国外交的影响有深入的分析。^④ 另外，美国学者本杰明·金斯伯格（Benjamin Ginsberg）在《身份与政治：美国犹太人领导权的两难》一文中，对美国犹太人独特的身份认同及其对美国政治与外交的影响有独到的分析。^⑤ 1988年出版的《天主教会与人权：它在美国对外政策形成方面所扮

① Elliott Abrams, ed., *The Influence of Faith: Religious Groups and U. S. Foreign Policy*, Lanham, Maryland: Rowman & Littlefield Publishers, Inc., 2001, pp. 20—21.

② J. Bryan Hehir, et al., *Liberty and Power: A Dialogue on Religion and U. S. Foreign Policy, In an Unjust World*, Washington, D. C.: Brookings Institution Press, 2004.

③ David Howard Goldberg, *Foreign Policy and Ethnic Interest Groups: American and Canadian Jews Lobby for Israel*, Westport, Connecticut: Greenwood Press, Inc., 1990.

④ Tivnan, *The Lobby: Jewish Political Power and American Foreign Policy*, New York: Simon & Schuster, Inc., 1987.

⑤ Benjamin Ginsberg, “Identity and Politics: Dilemmas of Jewish Leadership in America,” in L. Sandy Maisel, ed., *Jews in American Politics*, Lanham, Maryland: Rowman & Littlefield Publishers, Inc., 2001.

演的角色,1945—1980》一书对天主教会在形成美国人权外交方面的作用进行了初步尝试。^①

在研究“宗教与美国外交”这一课题时,还有一个无法回避的问题,即美国与伊斯兰世界的冲突中是否存在宗教文化因素。“9·11事件”的发生,促使更多的学者开始深入思考这个问题。在西方学术界,亨廷顿对这一问题有着敏锐的洞察力以及独到的见解。关于亨廷顿对这一问题的认识,集中体现在他撰写的《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以及《我们是谁?美国国家特性面临的挑战》这两本书中。就已有研究成果而言,学者们更多的是站在伊斯兰文化的角度认识美国与伊斯兰世界冲突中的宗教文化因素。能够站在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基督教文化角度,深入分析基督教文化对美国认识伊斯兰世界的影响,这样的研究成果非常有限。就笔者接触到的有限研究成果而言,西方学者对某些局部问题有所触及。美国纽约莎拉·劳伦斯学院(Sarah Lawrence College)国际事务与中东研究中心的法瓦兹·A. 格盖兹(Fawaz A. Gerges)教授在《美国人眼中的伊斯兰与穆斯林》一文中比较全面地分析了美国对伊斯兰世界认识的发展变化。格盖兹认为,美国在冷战期间对伊斯兰世界的政策基于冷战思维与战略考虑,而并非基于历史、文化或任何对伊斯兰教本能的畏惧与仇视心理。但是,作者也承认,冷战结束后的“9·11事件”加深了西方基督教世界与伊斯兰世界之间的文化对抗心理。^②此外,法国学者加森·萨勒梅(Ghassan Salame)在美国《对外政策》期刊上发表《伊斯兰与西方》一文,阐述了自己对政治伊斯兰的认识,文章也间接涉及美国对伊斯兰世界的认识。^③另外,美国东卡罗莱纳大学(East Carolina University)的乔迪·C. 鲍姆格特纳(Jody C. Baumgartner)等学者在《文明的冲突?公众的宗教观在美国对中东政策的影响》一文中阐述了美国福音派对于美国发动反恐战争的态度。作者列举了部分福音派领导人诋毁伊斯兰世界的言论,这对于我们从宗教观上理解美国对伊斯兰世界的态度具有一定的启发

① Jo Renee Formicola, *The Catholic Church and Human Rights: Its Role in the Formulation of U. S. Policy, 1945—1980*, New York & London: Garland Publishing, Inc., 1988.

② Fawaz A. Gerges, “Islam and Muslims in the Mind of America,” *The ANNALS of the American Academy of Political and Social Science*, Vol. 588, July 2003.

③ Salame, “Islam and the West,” *Foreign Policy*, No. 90, Spring 1993.



作用。^① 2004 年, 美国“太平洋理事会”(the Pacific Council) 的研究员杰克·迈尔斯(Jack Miles) 在《宗教与美国对外政策》一文中指出, “9·11 事件”将宗教以全新而紧迫的方式置于美国人的议程之中。但是, 从更为狭义的角度上讲, “9·11 事件”似乎将穆斯林宗教以伊斯兰恐怖主义的形式置于美国人议程之中。作者重点分析了“9·11 事件”之后, 宗教在美国处理与伊斯兰极端恐怖主义关系中的作用。^②

2. 国内研究现状

国内学术界对宗教与美国外交问题的研究起步于冷战结束之后, 而且这种研究最初主要基于美国宗教与政治的关系或美国文化与外交的关系层面。就文化的深层含义或政治的延伸而言, 这种研究初步触及美国宗教与外交之间的关系。在美国宗教与政治关系方面, 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所刘澎研究员的论文值得一提。1997 年, 刘澎研究员在《美国研究》上发表文章《宗教右翼与美国政治》, 该论文在重点探讨宗教右翼对美国国内政治影响的同时也初步涉及宗教右翼对美国外交的影响。^③ 2002 年, 东北师范大学历史系董小川教授出版其专著《20 世纪美国宗教与政治》, 作者在深入探讨美国宗教与政治的各个层面方面, 专设一章对宗教民族主义与美国外交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初步研究。^④ 在美国文化与外交关系研究方面, 南开大学历史学院王晓德教授的专著《美国文化与外交》具有较高的学术声誉。作者在探讨美国文化中的“天赋使命”时, 实际上已经触及这种“天赋使命”的宗教根基。^⑤

具体到论文方面, 国内有少数学者在这方面有了初步的研究成果。例如, 中国社科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王鸣鸣博士的研究成果“宗教信仰与美国对外政策”(该文曾作为中国外交部的内部咨询报告)。王鸣鸣博士

① Jody C Baumgartner, Peter L. Francia and Jonathan S. Morris, “A Clash of Civilizations? The Influence of Religion on Public Opinion of U. S. Foreign Policy in the Middle East,” *Political Research Quarterly*, Vol. 61, No. 2, 2008.

② Jack Miles, “Religion and American Foreign Policy,” *Survival*, Vol. 46, No. 1, Spring 2004.

③ 刘澎:《宗教右翼与美国政治》, 载《美国研究》1997 年第 4 期。

④ 董小川:《20 世纪美国宗教与政治》, 人民出版社 2002 年版。

⑤ 王晓德:《美国文化与外交》, 世界知识出版社 2000 年版。